

# 斯腾豪斯人文学科 课程变革思想的形成

范敏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人文学科课程变革思想的形成是斯腾豪斯个人成长和研究经历中的一系列关键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发现,“社区生活的经历与文法学校教育模式的影响”“研究生导师及其所建立的教育共同体的启发”“第一次出国经历与社会学教职带来的兴趣转变”和“《文化与教育》的写作与出版”这些事件引发并促使他对教育解放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变得逐渐清晰,而“在人文学科课程计划中实践教育解放的理想”则在实践层面上验证并丰富了人文学科课程变革思想,这些关键事件共同促使斯腾豪斯人文学科课程变革思想最终得以形成。

**关键词:**斯腾豪斯;人文学科课程变革;思想;关键事件

**中图分类号:**G632.3;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7)03-0043-07

英国课程学者斯腾豪斯是课程开发“过程模式”的提出者,也是20世纪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人文学科课程计划”(The Humanities Curriculum Project)的总设计师。研究发现,“人文学科课程计划”的形成并非是一件偶然性事件,它是斯腾豪斯个人成长和研究经历中的一系列事件与当时英国中等-现代中学课程改革的实际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尝试从“关键事件”的角度来阐述斯腾豪斯人文学科课程变革思想的形成,揭示人文学科课程从一种思想逐渐演变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课程改革运动的历程。

## 一、社区生活的经历与文法学校教育模式的影响

幼年社区生活的体验以及文法学校教育中教师给学生赋权的教学模式是斯腾豪斯人文学科变革思想的起源——通过知识教学来给学生赋权这一思想灵感的最初来源。

### (一)幼年的社区生活与话语权的初步感知

劳伦斯·亚历山大·斯腾豪斯<sup>[1]40</sup>(Lawrence Alexander Stenhouse)1926年3月29日出生在伯纳戈花园村东街17号一栋租赁的排屋中,这栋排屋背向着煤渣覆盖的巷子和其他居民房子的花园。斯腾豪斯对幼年居住地的描述是:“一种有魅力的合作性的住宅区模式,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共同体的感觉”<sup>[1]8</sup>。伯纳戈花园村与一场花园郊区运动——努力为过度拥挤的工业城市生活及其环境性和社会性退化问题提供解决办法的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受到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收稿日期:2016-09-29

作者简介:范敏,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斯腾豪斯的‘教师成为研究者’思想及其实践模式研究”(2016-GX-090),项目负责人:范敏;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斯腾豪斯的课程思想研究”(SWU1509536)和“20世纪英国教师研究运动的形成及其启示”(SWU1509490),项目负责人:范敏。

Howard)和奥克塔维亚山(Octavia Hill)的思想,阳光港(Port Sunlight)、伯恩维勒(Bournville)和莱奇沃思(Letchworth)这些城市的发展,以及德国城镇规划方法这些因素的影响,曼彻斯特的花园郊区运动得到了旨在为人们改善不健康的住宅和环境的公民协会(the Citizens Associ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nwholesome Dwellings and Surroundings of the People)的引导,同时伯纳戈的发展也得到了曼彻斯特租客有限公司(Manchester Tenants Ltd)的资助,该公司发起了一种“让租客将房屋的拥有者和他们正在使用的房子的外部资产的拥有者联系起来”的“合伙系统(co-partnership system)”<sup>[1]8</sup>。花园村的租客们享有比平常更多的权力,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更大的集体股权和话语权。这样的生活环境让幼年的斯腾豪斯对“话语权”有了初步的感知:“村庄的生活让斯腾豪斯对共同体的感觉和团结的精神有了充分的感知;而且也许给斯腾豪斯提供了麦克唐纳在他的葬礼致辞上所提到的自主权和共同体之间的平衡感。”<sup>[1]8</sup>

## (二)曼彻斯特文法学校教育模式的影响

曼彻斯特文法学校(Manchester Grammar School)成立于16世纪早期,在那个时代一直处于学术性教育的前沿<sup>[1]10</sup>。斯腾豪斯在曼彻斯特文法学校选择的是历史第六学级<sup>[1]12</sup>,而这几年的学习也成为了他所经历的“最有益的教育经验”。这段教育经历赋予他的是:知识、自信和勇气,他对知识和探究的热爱,他对讨论作为一种学习基础的价值的信仰<sup>[1]11</sup>。斯腾豪斯曾经在他的自传以及他与同事的谈话中提到过这段在文法学校的日子,他长期的合作伙伴琼·雷达克(Jean Rudduck)也提到了曼彻斯特文法学校对斯腾豪斯所产生的影响是较大的,而第六学级时候历史课的教学方式给他提供了人文学科课程计划(HCP)的一种模式。

在这所学校里有三位教师的教学对后来人文学科课程变革思想的形成及斯腾豪斯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位教师是他的历史老师帮恩(Bunn)。对于帮恩,斯腾豪斯的描述是:“沉默寡言但眼睛却是微笑的(Taciturn but merry-eyed),他被赋予了智慧与反讽,三年中帮恩将历史置于我们的力量之内,并使它成为我们思考和思辨的工具,然而同时它也是对我们学识的一种挑战”。帮恩给斯腾豪斯布置的第一篇论文是“写一篇文章解释橄榄球并列争球规则的变化,在这篇文章中要对委员会已经努力去实现的规则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提出建议”。他还给斯腾豪斯布置了另一篇关于梅特涅(Metternich,奥地利的统治者)返回奥地利的文章,文章附有这样的评论:“现在,作为一位年轻的激进的(统治者),选择任何一位虽然被误导的,但在政治上却是精明而有能力的,保守的政治家,写出对他品质的赞赏。”<sup>[1]12</sup>除了历史,帮恩还教通识教育(general studies),并鼓励他的学生参与艺术、文学、电影和社会学的学习。帮恩的妻子,布里奇特(Bridget),也对通识教育项目做出了贡献。在帮恩退休的时候,曼彻斯特文法学校的高中部主任埃里克·詹姆斯(Eric James)提到:“历史对他而言不仅仅只是一门学科,或是对过去发生了什么的一种解释,它是整个思维的一种冒险。它的界限足够宽广,以至于涵盖了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音乐、建筑甚至是它的科学”<sup>[1]12</sup>。斯腾豪斯有点敬畏帮恩,“虽然是一位敬仰的人,但却与他保持了一定的心理距离”<sup>[1]12</sup>。帮恩对知识冒险的感觉、对学习和艺术的热爱,以及他对学生知识独立性发展的承诺对斯腾豪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位是英语教师乔治·梅森(George Mason),“是热心且健谈的,一位能够与他争论且交换意见,一位可以通过反对他的思想来塑造自己思想的教师”<sup>[1]12</sup>。第三位是法语教师约翰尼·林嘉德(Johnny Lingard)。他常邀请学生到家里去听经典作曲家的曲子,并说服他们去听哈莉音乐会、欣赏芭蕾舞<sup>[1]12</sup>。关于这些人对他的影响,斯腾豪斯写道:“所有这些人,给我提供了其它选择:一种思想、艺术和学问的世界,虽然这些选择对我而言没有实际地设想过。”<sup>[1]12</sup>

在《权威、教育与解放》(Authority, Education and Emancipation: A Collection of Papers)这本文集的介绍中,斯腾豪斯提到,对当前学校教育的现实与文法学校这段教育经历之间差距的反思是他研究问题产生的缘起:“作为曼彻斯特文法学校的学生,我在第六学级的时候很幸运地遇到了三

位教师——帮恩、梅森和林嘉德——他们以一种增强我权力感的方式将观点传递给我。当我开始教学的时候,我发现虽然学校系统重视狭窄界定的成绩,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不重视通过知识来解放学生。我也不可能在系统内满意地做到我曾经所经历的那样。用现在的术语来表达那个问题就是,教育涉及到的是对知识分配的再生产;我已经进入了一所享有特权的学校,在这所学校中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对我而言就是我的权利;现在我所教学的学校信息都是直接传递的,能够选择的信息几乎没有……”<sup>[2]10</sup>至此,对教育解放问题的关注成为了斯腾豪斯一生研究与实践的主题。

## 二、研究生导师及其所建立的教育共同体的启发

斯腾豪斯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多学科的阅读经历以及毕业之后在其研究生导师建立的教育共同体内工作的经历塑造了他的思想,激发了他对课程的研究兴趣,并为其研究问题的提炼与聚焦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实践经验。

### (一)教育解放作为研究问题的初步感知

斯腾豪斯对“教育解放”这一主题的思考始于1951到1956年间,他在斯坦利·尼斯贝特(Stanley Nibet)教授和肯尼斯·里士满(Kenneth Richmond)教授的指导下,在格拉斯哥大学(Glasgow University)攻读硕士学位。在一系列学生作业中,他在通识教育和道德教育(general and moral education)以及灌输问题之间挣扎。在一次考试的答题过程中,他发现道德教育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为教师的任职资格是学术性的,而不是道德方面的。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领域工作,在巴布(Zevedei Barbu)的指导下攻读同一个学位,让他能够系统地阅读马克思(Marx)、帕雷托(Pareto)、韦伯(Weber)和涂尔干(Durkheim)的作品,这些社会理论对他的问题给出了丰富的解释,也塑造了他的思想。在1954年的夏天,他发现并阅读了在当时不是很流行的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作品,在其引导下又转向萨丕尔(Sapir)、沃尔夫(Whorf)和维果茨基(Vygotsky)几位学者的作品。同时他也开始涉及人类学,阅读了一些特殊的人类学研究资料<sup>[2]10</sup>。与此同时,对文化的兴趣很自然地将他的目光引向了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mass communication and mass culture),他透过布鲁默(Blumer)的电影作品来了解这些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到1956年毕业的时候,他将研究问题表述为从广义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t)的视角来看文化与个体和个体权力发展的关系,文化与新意义的创造、文化改革的关系<sup>[2]10</sup>。

### (二)杜伦研究所的工作经历及同事的启发

1956年斯腾豪斯从格拉斯哥大学教育学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获得了威廉·博伊德奖(William Boyd Prize)并成为那年最杰出的学生。一年之后,他被任命为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教育研究所心理学以及中学教育的导师,而这个研究所的主任正是他的导师斯坦利·尼斯贝特(Stanley Nisbet)教授。研究所是由杜伦大学培训与考试联合委员会(the Durham University Joint Board for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s)发展而来的,由10个会员教育学院和大学教育系构成<sup>[1]13</sup>。杜伦研究所坚定地致力于学校实践的改进,斯腾豪斯是9位教职员工之一,其主要工作是为当地的教师提供在职培训。研究所在教师培训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斯坦利·尼斯贝特,这位教授,用一种福禄贝尔课程(Froebel course)开创了研究所的在职培训项目,而且利用这门课程,他已经开创了访问那些注册参加研究所文凭课程的有经验的教师的学校和课堂的先例。”<sup>[2]10</sup>而且,自从1948年研究所成立以来,斯坦利·尼斯贝特教授通过提供研究奖学金来鼓励他的职员教师、大学研究者和在职的教师去做研究。同时,研究所有每年都要出版五期的杂志——《杜伦大学教育研究所期刊》(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of Durham University)以及研究评论——《杜伦研究评论》(The Durham Research Review),主要发表教育心理学和教育历史领域中有原创性的研究<sup>[1]13</sup>。

同时,斯腾豪斯对课程研究的兴趣还被研究所里另一位教师罗尼莫里斯(Ronald Morris)所激发,“罗尼·莫里斯鼓励我集中于课程,将其作为研究的焦点并用她的精明给我出难题”<sup>[2]10</sup>。斯腾

豪斯对她的记忆是“利用录音机在课堂上监控教学,并鼓励教师去研究他们自己实践的先锋”<sup>[1]14</sup>。莫里斯在学术上一直以遭受失败的贫困的男孩和女孩为研究对象,并支持教师利用课堂实验来研究在散文和诗歌中形成自由表达的策略。她对改进普通孩子的文化知识学习充满热情,她认为“笨孩子”就像聪明小孩一样,应该而且能够从一种教育中获益,这种教育“不是一种要锻炼的技能和要储存的事实,而是与个体个性中的变化有关,这种变化是当他在他所生活的社会所提供的教育经验中努力前进的时候就会出现”<sup>[1]14</sup>。

这段时期,斯腾豪斯的研究与实践深深受到莫里斯的影响。“我发现自己在纽卡斯尔(Newcastle)、米德尔斯布勒(Middlesbrough)和卡莱尔(Carlisle)与中学教师们分享最新的罗尼·莫里斯课程(Ronnie Morris courses),并访问了大量的学校,这些学校的范围从未重新组织的小学到新建立的现代中学。那里有大量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且有大量的机会去学习它。”<sup>[2]11</sup>同时,在这段时期,斯腾豪斯还受到了著名戏剧导师希斯考特(Dorothy Heathcote)的启发。他看到她以即兴表演戏剧的形式与男孩子们做游戏,并发现她之所以能够面对并利用行为不良的年轻人的经验原因在于她将违法转变为戏剧的法律,而这使得她能够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sup>[2]11</sup>。

### 三、第一次出国经历与社会学教职带来的兴趣转变

第一次出国经历不仅让斯腾豪斯对比较教育产生了兴趣,而且引发了他对研究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他开始关注如何通过教育重新阐释“增强学生权力”这一问题,而社会学教职的契机则让他将研究聚焦到了互动小组的微文化和小组学习。

#### (一) 尼森对综合小学的兴趣所产生的启发

1956年研究所组织了一次关于教师培训的英挪会议(Anglo-Norwegian Conference),1958年8月,第二次会议在挪威召开。对斯腾豪斯而言,这是第一次出国的经历<sup>[1]14</sup>。在那里他遇到了佩尔·兰德(Per Rand)——之后成为奥斯陆大学和挪威研究委员会中的一位教育学教授和伟大的人物,也是斯腾豪斯一生的朋友。斯腾豪斯被挪威所吸引并逐渐学习了挪威语言。结合对历史和比较教育的兴趣,他开始研究哈特维格·尼森(Hartvig Nissen)关于19世纪中期苏格兰教育系统的相关著作。尼森(Hartvig Nissen)对斯腾豪斯的影响很大,斯腾豪斯所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就是对他作品的解释。

斯腾豪斯明确地提到过尼森对人文学科课程计划产生了影响<sup>[2]11</sup>。尼森对苏格兰学校里广泛应用的百科全书式的读物非常感兴趣,而人文学科课程计划所采用的是一种活页式的材料,这在某种程度上沿用了20世纪古老的百科全书式读物的模式。而且,人文学科课程计划研究团队的成员也遇到了尼森在某些场景中所预示的一种愿望。1852年,尼森获得了一项政府津贴去访问苏格兰并研究大卫·斯托和约翰·伍德(David Stow and John Wood)时期的苏格兰教育系统。尼森在他所访问的一所学校描述并评论了一场阅读考试<sup>[2]12</sup>:

“在英语中一些篇目是从阅读书中读到的。所有的篇目(没有例外)读起来都很好。因此,一名非常有活力的13岁男孩,必须读一篇短小的修辞的文章,文章的开头是:‘自由是与英国的土壤相称的而且与它不可分离;英国的法律声明,即使对于陌生人和旅居者而言,他们的脚踏入英国土壤的那一刻,他所踏的那片土壤是神圣的,被普遍的解放的精神所尊崇!’他带着绝对的确定性在阅读,伴随着强烈而准确的声调,带着一种表情,这种表情表现出深层和高贵的英国式的自我宣称的自信,而且他带动了所有的人,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而且,尼森评论道<sup>[2]13</sup>:

“……当公立学校(common school)中最普通的工人的儿子正在利用学校所提供的教学材料,去打动他长辈的心弦,并将他们一起带入情绪的洪流中的时候,此时一个人不仅理解而且还感觉到,这个人是他们其中之一,而且教育,虽然在水平上是各有差异的,但却也是类似的,它对人们的

所有选择而言都是共有的。”

尼森对综合小学的热情将斯腾豪斯引入了充满希望的思考中。受此启发,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在现代学校中如何去重新阐释这样一种指向可能增加学生权力和独立性的民主的理智的愿望?”<sup>[2]</sup>而且他认为,假如阅读材料的内容不是被视为一种练习的机会,也不是被视为要掌握的东西,而是被视为学习小组内部学生之间互动的文化基础的话,那么就需要去增加学校阅读材料内容的严肃性。这一思想后来则被直接运用到了人文学科课程计划的课程开发中。

## (二)社会学的教职带来兴趣的转变

对于社会中能够获得的文化以及互动小组的微文化,尤其是对学习小组之间关系的关注变成了斯腾豪斯兴趣的中心,于是问题变成了在一种足够可行的意义下解释知识和文化。而且,此时的环境对他的兴趣做出了回应:纽卡斯尔的研究所没有社会学的教师,这使得他能够搬到那里去教社会学。在那些日子里仅仅少数人是被正式认可的合格的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ernstein)、皮特斯(Peters)和怀斯曼(Wiseman)力促教师教育者以一种有贡献的学科为基础的聚合性课程来代替整合性课程,使得对改编或者再培训的需要出现了<sup>[2]13</sup>。随后,达勒姆彼得学院(Bede College Durham)的一位教师比尔·泰勒(Bill Taylor)和斯腾豪斯一起为学院中这个领域的教师们组织了一个社会学阅读小组,让他们能够在一起互相分享阅读心得。

## 四、《文化与教育》的写作与出版

虽然斯腾豪斯对纽斯卡尔的工作环境不满意<sup>[2]14</sup>,但是他仍旧在那里呆了6年,而这6年也正是斯腾豪斯的思想获得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在那里完成了《文化与教育》(Culture and Education)这本书的写作,正如评论所说,这本书是斯腾豪斯社会学的知识在教育中的第一次运用<sup>[2]14</sup>,而且它呈现了斯腾豪斯关于人文学科课程计划的一些早期的思考。在书中,斯腾豪斯提到了通识教育的问题,他认为这种通识教育应该让所有的中学年龄阶段的学生都可以得到,它可以更加清楚地表达为“普通孩子的教育”。与他的同事罗尼·莫里斯一样,斯腾豪斯所关心的是大多数没有入选文法学校的孩子的教育质量。

人文学科课程计划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的观点已经在《文化与教育》这本书中得到了阐述。比如,在这书中斯腾豪斯力倡教育必须创造并传递与大多数青年人的生活有关的文化;他认为在教学情境的理解中标准比目标要重要得多;此外,课程不应该被视为教学的材料,而应该被视为学生讨论和思考的基础。在他看来,“一种好的课程是让有价值的标准成为可能的课程”<sup>[3]89</sup>。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的五年期间,斯腾豪斯被邀请到奥斯陆大学去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教师的工作是让班级作为一个群体自我批判性地运转”而且“真正的教育标准是那些形成并清晰地阐述学生自我批判能力的标准”。他认为“自我批判的标准只有在与志同道合的群体一起的工作中才能得到保持”<sup>[4]</sup>。同时,在这本书的倒数第二章的结尾,斯腾豪斯设想了一种可能为中等-现代中学的孩子提供生气勃勃的教育的课程<sup>[3]147</sup>:

采用以成人兴趣为中心的课程,用“经验”而不是“事实”来寻求解决方法,以及客观地面对经验,似乎会促进有经验的教师去创设良好的课堂情境。在教育中运用得比较多的那些方法导致了教学内容的贫乏,从而减少了受教育者的教育机遇。

## 五、在人文学科课程计划中实践教育解放的理想

斯腾豪斯本人不仅是一位课程理论家,更是英国乃至世界著名的课程改革实践者,人文学科课程计划是其对教育解放理念的集中检验。

### (一)斯腾豪斯与人文学科课程计划的“相遇”

1966年《文化与教育》这本书还在出版中的时候,斯腾豪斯第一次出访美国参加会议,在那里

他遇见了乔斯林·欧文(Joslyn Owen)——学校委员会的联合秘书之一。斯腾豪斯与他谈论了自己的作品,而且还送了他一本打印稿。同年秋天他被邀请到纳菲尔德旅馆(Nuffield Lodge)参加为期一天的、由托尼·比彻(Tony Becher)担任会议主席的会议<sup>[2]15</sup>。那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之后变成了学校委员会的第II号工作文件——《社会与年轻的中学毕业生》(Society and the Young School Leaver)<sup>[5]</sup>。在会议上斯腾豪斯对这份报告的反应是尤其不友好的,而且他还讲得很直率,并认为需要更丰富的课程内容,需要将“年轻的毕业生”与那些继续留下来的学生进行整合——因为“早毕业的学生”不久将会——直到考试的那年,需要教师用可能在班级中形成的方法对其进行更加清晰的帮助<sup>[2]15</sup>。

斯腾豪斯回到苏格兰后不久就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说那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一项课程计划寻找可能的主持人候选人,而且他们决定让他担任这个主持人。这项实际上在资金上已经有保障的计划被称为“人文学科课程计划”(the Humanities Curriculum Project)。斯腾豪斯曾经在《文化与教育》这本书中写到过一篇名称为《课堂中的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 in the Classroom)的文章。在他看来,这种机遇暗示他,似乎他正在被给予这样一种机会,去通过一项较大的课程计划来形成并验证他在过去多年来一直倡导并从事的一套观点。虽然许多年以后斯腾豪斯才发现事实上纳菲尔德基金会(Nuffield Foundation)或者学校委员会(the School Council)中没有任何人读过他给的打印稿<sup>[2]15</sup>。

## (二)人文学科课程计划中的教育解放实践

事实上,斯腾豪斯一直在以14~16岁的学生为对象,探索争议性问题领域的教学问题,而且已经创造了一些材料并对一些方法进行了实验。虽然斯腾豪斯所从事的课程和教学模式对于大部分年龄和能力范围的学生而言都是合适的,但是在人文学科课程计划中,他却将注意力集中在了那些具有最早离校可能性的学生,即可能被称为“辍学者”(drop-outs)的学生上。人文学科课程计划的任务是,与教师合作,基于探索而在人文学科的教学开展一系列实验,其目标是“形成对人类行为、社会情境和他们所提出的价值问题的一种理解”<sup>[6]</sup>。由于此计划是在争议性问题领域中进行工作,计划小组所采用的教学策略是,试图去设计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推动他们理解的同时,使得教师训练自己去做所有他们能做的来保护学生免于受到他所持有的偏见的伤害”<sup>[6]</sup>。

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斯腾豪斯排除了两种目标:与价值-问题的思考相分离的知识的获得,以及一种特殊的价值-立场(value-position)的教授。这允许第3种解决方案的出现,也就是——学生们应该依据他们所提出的“价值-问题”形成他们对人类行动和情境的理解。这种目标指定了一种学习过程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学习结果。斯腾豪斯拒绝将结果的构成部分进行具体化,而是认为,它隐含在一套过程原则中<sup>[7]</sup>:第一,这种争议性问题应该是学校课程内容的构成部分;第二,问题的讨论而不是说教式的教学应该构成教学过程的核心;第三,教师们应该抑制自己利用课堂来传递自己观点倾向的平台;第四,讨论中的分歧应该得到保护;第五,教师对讨论中运用的批判性标准负责,比如保证观点和论点经受住标准的推理和证据的检验。

围绕以上这些观点,斯腾豪斯及其团队建构了人文学科课程开发的“过程模式”来实践他知识解放的教育理想。埃利奥特对此评论道:“人文学科课程计划被设计成了一种说明,对一种关于‘价值-问题’的教和学的有价值的‘教育’过程的说明,没有精确地决定结果是什么。人文学科课程计划预设这些将构成基于多种不同的价值立场的争议性人类行为和情境的多样性解释。这个过程所做的,就是给学生提供依据其他可以选择的观点来修正和重构他们价值的机会。”<sup>[8]56</sup>可以说,人文学科课程计划在实践层面上验证并丰富了斯腾豪斯关于人文学科课程变革的相关思想。此后,斯腾豪斯在主持和参与的“种族关系教学的问题和影响”(The Problems and Effects of Teaching about Race Relations)等一系列研究与实践中,继续以课程为载体探索教育解放的路径,而这也构成了他一生中教育与研究的主旋律,最终促成了其人文学科课程变革思想体系的形成。

## 参考文献:

- [1] JOHN E, NIGEL N(Eds).Curriculum ,Pedagogy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C].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 2012.
- [2] LAWRENCE S. Authority ,Education and Emancipation;a Collection of Papers[C]. London;Heinemann, 1983.
- [3] LAWRENCE S. Culture and Education[M]. London;Nelson, 1967.
- [4] LAWRENCE S.A 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Sociology of the Curriculum[J].PadagogiskForskning, 1963(3):120-134.
- [5] School Council. Society and the Young School Leaver (Working Paper No.11)[R].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67.
- [6] LAWRENCE S.The Humanities Curriculum Project;the Rationale[J] .Theory into Practice, 1971,10(3):154-162.
- [7] JOHN E.Teachers as Researchers: Implications for Supervision and for Teacher Education[J].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990,6(1):1-26.
- [8] JOHN E.Education in the Shadow of the Education Reform Act. In JEAN R (Ed.).An Education that Empowers: A Collection of Lectures in Memory of Lawrence Stenhouse[C].Clevedon,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5.

## The Formation of Stenhouse's Thoughts of Humanities Curriculum Reform

FAN Min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Stenhouse's thoughts of Humanities Curriculum Reform was the emergent property resulting from interactions among a series of critical incidents in his personal growth and research experienc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experience of village life and influence of education model in Manchester Grammar School", "the inspirations from his supervisor and the educational community which was founded by him", "first experience of going abroad and interest alteration resulting from his sociology teaching occupation", and "writing and publishing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gave rise to his thoughts and promoted his gradual articulation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the question of education liberation. Besides, the incident of "implementing the ideas of education liberation in the Humanities Curriculum Project" verified and enriched the thoughts of Humanities Curriculum Reform in practice. All these incidents jointl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his thoughts of Humanities Curriculum Reform.

**Key words:** Lawrence Stenhouse; The Humanities Curriculum Reform; thoughts; critical incidents

责任编辑 李 航